

辯論不避針鋒相對、 引據說理即好

讀去年12月號(44期)中周錫瑞和艾爾曼、胡志德的論爭文章，有驚心動魄之感。周的批評不僅涉及美國漢學家何偉亞論著的硬傷(對原始材料的解釋)和軟傷(所謂後現代主義的史學立場)，還觸及美國漢學界的學術評判制度，因為何著被美國亞洲學會授予列文森最佳著作獎。如果何著確有周文指出的那些硬傷(且不論軟傷)，那麼，最佳著作獎的評審委員會的學術嚴謹度也就可疑了。

硬傷其實沒有甚麼好說的，搞錯了就搞錯了，比較難說清的是解釋框架。歷史與歷史解釋的思想基礎一直有張力，不妨想想從錢穆到郭沫若、范文瀾再到黃宇仁對國史的解釋範式的不同。周文攻擊了何著的「後現代主義」解釋方法，艾、胡文回應說：「史學在中國和美國都是一個長期任不可一世的現代話語機制縱情踐踏歷史原貌的學術園地。」我看這話用於何著同樣恰當，只需把「現代話語」換成「後現代話語」就可以了。任何歷史解釋都是某種「話語機制」在「踐踏歷史原貌」，然而，學界又不可能找到共同一致的「話語機制」，到頭來還是看你自己喜歡甚麼「話語機制」而已。至於「政治正確」的分辨，恐怕還是有必要的，只不過「正確」的標準不是官府定的，而是論辨出來的。

艾爾曼是著作獎的評審委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員，他出來為何著辯護，自然也是為自己 and 評審委員會辯護——他們沒有搞錯，完全可以理解。我覺得，令人興奮的是，《二十一世紀》能組織這樣的論爭文章。吵架動點火氣是太人性的事，畢竟雙方都還是在引據、說理。學術的進展既靠研究的積累，也需要論爭的促進。如果內地的學刊也能有這類學術溝通行動，我以為是漢語學界的幸事。

譚音之 重慶
98.1

不應對世界與中國的大 事件裝聾作啞

《二十一世紀》去年10月號刊出一組重頭專論文章「十月革命八十年與社會主義反思」，讀後生出許多感慨。

記得在我們年輕時，紀念俄國十月革命的文章從來都是《人民日報》的重頭戲。但時移世易，那些「左派理論家」生花妙筆寫出的文章，有沒有一篇經受得住歷史的檢驗，又有多少能給人們留下一點印象？

蘇聯的解體，無疑是本世紀即將結束時最令人震驚、惶惑和深思的大事。存在了70年的超級大帝國，怎麼說垮就垮？導致這帝國產生的那場

革命，是歷史的必然，還是俄羅斯人民和人類的悲劇？它是怎樣發生的，它的產生是否已埋下了日後轟然倒塌的種子？對於發生在自己近鄰身邊的歷史巨變，中國思想學術界不知是有意地裝聾作啞，還是被迫緘口不言？須知，「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曾是中國朝野上下一直唸叨的口頭禪啊。幸好，《二十一世紀》作出了應有的反應。

聯想到「反右」鬥爭、文化大革命運動等等，每一次對中國當代歷史上最重大事件的回顧反思，都是《二十一世紀》等少數海外刊物作出的，國內成千上萬的報刊，一概啞口無言。似乎那慘絕人寰的悲劇、那刻骨銘心的痛苦，早就化成了一縷青煙；似乎50至70年代的中國大陸的歷史，是由無關痛癢的日子和巨大的空白、莫名其妙的間斷構成的。強使一個民族不能直面歷史，將是歷史的罪人。

薛雲 北京
97.12.20

為甚麼我們喪失了對話 的能力？

貴刊1997年12月號羅崗的文章中提到張紫葛的《心香淚

酒祭吳宓》，此書是去年大陸的暢銷書，也在知識界引起強烈反響。不少報刊就1949年以後的吳宓形象以及張書是否「歪曲」了吳宓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各有各的史料和觀念。本來，事情是可以通過學術的討論而加以澄清的，畢竟許多當事人還在世，吳宓留下的日記、文稿俱在，然而，意識形態部門一聲令下，就將這場討論壓制下去，再也不准提起該書。如今大陸不要說討論公共問題的公共空間不存在，就連起碼的學術自由都大受限制，這是海外的一般人所無法體會的。自從90年代以後，大陸思想界出現了明顯的分化，對同一個問題，在知識圈中常常發生嚴重的對立。這種種分化未必不是好事，它恰恰是多元的前提。然而，由於公共空間的萎縮，知識份子之間缺乏真誠的探討交流，常常是各自「獨白」，彼此誤讀，甚至相互攻擊。這就造成了如今大陸思想界的多重「割據」，無法形成健康、有序的對話溝通機制。中國知識份子彼此的思想分歧，實際上並非如表面呈現的那麼大，對立雙方有些思想預設恐

怕還是一致的。但中國知識份子之間只有無聊的爭論，這很值得我們深思。究竟是一些甚麼樣的因素使我們喪失了對話的可能？

朱萌 上海
97.12.25

應在現代性框架中分析意識形態政治文化運動

《二十一世紀》1997年4月號刊載了金觀濤、劉青峰的〈反右運動與延安整風〉。該文揭示並分析了成形於延安整風運動中的意識形態群眾運動的模式及其功能，應該說觸及了中國當代社會政治文化演變的一個相當重要的關節點。但是反覆閱讀，覺得該文一是有些過於強調此運動模式的「中國特有」性；二是過於重視其得以展開的具體歷史契機；三是過於強調其所造成的社會轉型的特殊結果。這樣就給人們造成一種印象，似乎這種政治—文化群眾運動的主要後果是造成了正常的現代化進程的斷裂，而它與啟蒙運動所開啟的現代性之間的內在聯繫則被忽略了。

眾所周知，那種與知識份子命運密切相關的政治—文化群眾運動，是整體性的社會改造的一部分，它與現代性的聯繫，也寄涵於這種整體性改造中。這種整一性的社會體制往往被看成極權式統治，與現代資本主義的民主制相對照。〈整風〉把反右看成是「從經濟建設」轉向階級鬥爭的轉折點，是將政治—文化運動模式戲劇化、外部化了。其實從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到1981年「撥亂反正」，也正是使用這套政治—文化運動模式成為了「自己的弒殺者」。文化—政治運動模式既在50年代造成了中國現代化進程的轉向，又於70、80年代之交發揮了使其回轉的作用，這說明了這一運動模式同現代化理想的內在聯繫。如果沒有這種聯繫，它就不可能聯接起所謂正反兩種歷史的轉變。

姚新勇 廣州
97.12

圖片來源

封面、封二 電腦製圖：林立偉；文字：金觀濤。
頁20、30、57、61、73、86、87、89、109、121、142、151、154 資料室圖片。
頁24、25 劉小軍攝。
頁75 *Nature* 390, 339 (27 November 1997).
頁76 *Nature* 390, 375 (27 November 1997).
頁78 *Nature* 390, 405 (27 November 1997).
頁81上 Antoine Jean Gros, *The Battle of Narareth* (1801).
頁81下 Claude Monet, *Poppy Field in a Hollow near Giverny* (1885).
頁82上左 André Derain, *Self-Portrait* (1914).
頁82上右 Albert Gleizes, *Landscape with Figure* (detail, 1911).
頁82下 André Derain, *Le Pont de Charing Cross, Londres* (detail, 1906).

頁83上 Franz Marc, *Composition with Oxen* (1913-1914).
頁83下左上 Henri Matisse, *The Dance* (1909).
頁83下左下 Henri Matisse, *The Moroccans* (1916).
頁83下右 Henri Matisse, *Blue Nude IV* (1952).
頁84上 André Derain, *Paysage à Cassis* (1907).
頁84下 Paolo Uccello, *The Flood* (detail).
頁92 尹欣：《寺廟巡禮》。
頁96 Paul A. Cohen, *History in Three Key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50.
頁133 郭少棠：《西方的巨變 1800-1980》(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3)，封面。
頁147 《亞洲週刊》，1997年2月17-23日，頁34。
封三 Paolo Uccello, *The Adoration of the Child* (detail).
封底 Paolo Uccello, *The Fall* (detail).